

猫头鹰中文系精选



舒 芜 著

周作人的是非功过

人民文学出版社

舒 芜 著

周作人的是非功过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舒芜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猫头鹰学术文丛精选)

ISBN 978-7-02-007933-9

I. 周… II. 舒… III. 周作人(1885 ~ 1967)—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8708 号

责任编辑:王培元

责任印制:李 博

周作人的是非功过

舒 芜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94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

199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978-7-02-007933-9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致 读 者

有一种猛禽，古时名“枭”，俗称“猫头鹰”。它习性古怪：黑夜活动，白昼栖息；即便睡去，也睁着一只眼睛。这独异的生活方式，使它拥有了与众不同的目光和视野。猫头鹰飞翔时悄无声息，偶尔发出一两声怪叫，难免令人惊悚。

在希腊神话中，它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型；在黑格尔的词典里，它是哲思的别名；而在鲁迅的生命世界中，它更是人格意志的象征。鲁迅一生都在寻找中国的猫头鹰。他虽不擅丹青，却描画过猫头鹰的图案。我们选取其中的一幅，作为丛书的标志。

我们渴慕智慧，我们祈求新声。这便是“猫头鹰学术文丛”的由来。

编 者

前 记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七篇，论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化史、新文学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是非功过；下编四篇，论鲁迅、周作人兄弟关系的发展变化，——这中间也有周作人的是非功过问题。

周作人的方面很广。本书首先对他一生的是非功过作了一个概观，然后分别研究了他的文化心态、他的自我论和宽容论、他的妇女论、他的文艺思想、他的散文艺术、他和鲁迅的兄弟关系，方面已经不少，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没有专门论及。例如，周作人和外国文学，特别是和古希腊文学、日本文学的关系，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鉴赏和评论，外国文学对他的文艺思想、文艺写作的影响，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大问题，我只是在第一篇里作了概观，没有另写专论，自揣无此学力。又如，周作人的儿童论和儿童文学论，他的文艺思想中的个性论、表现论、“言志”论，他和鲁迅失和决裂的经过实况，这些都有人研究过，我也只是在概观中涉及，自审没有太多的新意，故未分别写出专论。还有，解放后，周作人在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方面，在鲁迅

研究和有关鲁迅研究资料的提供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应该给以总结,但恐怕只有出版社的有关的编辑人员和鲁迅研究机构中的有关的研究人员来总结较为适宜,我不了解详细情况,无从谈起。我这里,只是在力所能及的并自以为有些新意的范围之内,探索了我认为重要的问题,虽非周作人之全,但是他的一些基本方面大概也差不多了吧。

本书各篇都陆续发表过,现在作了统一的整理。有些篇题与发表时略有不同,以归整齐。各篇长短不一,是内容决定的,就不强求均衡了。

从一九八六年四月写成第一篇,至今五年,这中间,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我在这里向他们致谢。尤其是,第一篇的发表,先后得到李学昆先生和朱正先生的大力支持,这对我的鼓励很大,如果没有这个开端,很可能以下各篇都不会写出来。在资料方面,许觉民先生、雷梦水先生、姚锡佩女士都给我很多的帮助。这几位是我特别要感谢的。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愿意出版这部书,在出版业目前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我自然明白这是多么可欣幸的事。

舒 芜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目次**上 编**

次

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

- 周作人概观 3

理性的清朗与现实的阴暗

- 周作人的文化心态 81

我思，故我在

- 周作人的自我论和宽容论 123

女性的发现

- 周作人的妇女论 134

向低处广处看

- 周作人的文艺文化结构观 193

中国新文学史的“溯源”

- 周作人对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的批判 220

两个鬼的文章

- 周作人的散文艺术 246

下 编

鲁迅、周作人失和以前的兄弟关系……………307

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356

鲁迅、周作人失和决裂后的间接联系……………374

鲁迅、周作人后期的相同点……………384

上 编

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

——周作人概观

一

周作人是谁？今天中国青年读者恐怕不少人答不上来；有些人能答出一点，大概也只说得出他是鲁迅的弟弟，也是个作家，很不争气，堕落成了汉奸，如此而已。如果告诉他们：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经是中国新青年心目中一个辉煌的名字，后来虽然逐渐暗淡了，但是，据周建人回忆，抗战前不久，冯雪峰还表示过这样的意思：“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①后来，抗战爆发，周作人留在沦陷了的北平，全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十分关心他的安危出处，郭沫若在上海发表了怀念周作人的文章，引用古诗“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说是只要周作人脱险南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②可是，五个月后周作人就辜负了这些关心，背叛了祖国；而郭沫若当时

正是冒险从日本潜回祖国来参加抗战，为爱国青年所敬仰的。今天的青年听到这些情况，恐怕吃惊不小，将信将疑。其实，这都不是太远的事，文艺界八十岁以上的老前辈们，都亲身经历过周作人的名字闪闪发光的时代。

那么，是不是要责怪青年对历史的无知，和极左文艺思想对历史的歪曲呢？当然二者都是事实，但是，还有另一个事实：周作人的确在祖国呼吸存亡之际，背叛了祖国，背叛了受难的人民，这是无可原谅的，不能不受到惩罚的。历史是无情的。

然而，历史又是有情的、公正的，这也常常是一个“曲线中的直线”的进程。近些年来，研究周作人的论著陆续发表了，周作人的历史功绩逐步透露给青年读者了，周作人作品的选集也开始公开出版了。周作人这一本账，现在看来是可以动手清理的时候了。这是很值得做的。因为周作人的身上，就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鲁迅的存在，离不开他毕生和周作人的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不了解周作人，也不可能了解一个完整的鲁迅。至于周作人的悲剧，则是和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格有着甚深的联系；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

二

究竟怎样来估价周作人的历史功绩，是首先要碰到的问题，或者说是今天我们研究周作人问题的一个前提。今天已经是

新的时期，我们已经能够而且应该把科学的态度和正义的愤怒很好地结合起来，“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③对周作人先前的历史功绩，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给以肯定，要肯定个够，不怕承认他在“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中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都是当时最高的水平，没有人超过他，没有人能代替他。

关于周作人的多方面的贡献，阿英曾有一个概括的评价：“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干部之一的周作人，在初期，是作为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以至于介绍世界文学的译家而存在的。他的论文《平民的文学》（1918）、《人的文学》（1918）、《新文学的要求》（1920），不仅表明了他个人的文学上的主张，对于当时的运动，也发生了很广大的影响。批评方面，《自己的园地》（1922）一辑，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同时也横扫了当时文坛上的反动势力的‘学衡派’批评家的封建思想。《沉沦》、《情诗》二评，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可说是很重要的文献。说到介绍，从最初的《域外小说集》，到《点滴》、《现代小说译丛》、《现代日本小说集》、《玛加尔的梦》、《陀螺》等成册的作品的翻译，是更足以证明他对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曾经贡献了怎样巨大的力。但是，到了一九二四年以后，他的努力与发展，却移向另一方面——小品文的写作，这以后周作人的名字，是和‘小品文’不可分离的被记忆在读者们的心里，他的前期的诸姿态，遂为他的小品文的盛名所掩。”^④阿英的概括，很得要领；我们再补充一个方面，即文化思想和文化评论方面，就更完整了。

周作人在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提出“思想革命”的口号，文化思想上的问题是她一直看重的。他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外国文学思潮，讲外国文学史，目的都是为了文化思想战线上的

斗争。他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功绩，正因为都具有文化思想上的意义，才高出于当时的一般的水平，也才能够成为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家很多，文学家而同时还是思想家的，大概只有鲁迅和周作人两人，尽管两人的思想不相同，各人的思想前后也有变化，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思想上的影响，则是一样的。

二

周作人最早是作为翻译家出现的。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发表周作人翻译的论文《陀思妥夫斯基之小说》（英国 W. B. Triter 作），这是他在这个新文化运动中心阵地上的第一次出阵。以后各期常有他的译文。第四卷第五号上，他发表了新文学运动中所作的第一篇论文《读武者小路君所作的一个青年的梦》，仍然是评论外国文学的。其实他从事翻译工作还早得多，他参加新文学运动之前，已经译出了三十四篇外国短篇小说、七部中篇小说，广泛阅读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著作。正是在这个底子上，一九一七年他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欧洲文学史，编出了中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讲义，这也是他参加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行动。后来大约直到一九二一年左右，他的写作工作仍以译述为重点，所译的欧洲和日本小说、小诗、散文，分别编为《陀螺》、《冥土旅行》、《狂言十番》、《空大鼓》等集出版，当时都成为广大文学青年的精神食粮和看向外界的窗口。

周作人的翻译工作，首先是一种启蒙工作，用鲁迅《摩罗诗

力说》中的话来说，就是“求新声于异邦”的工作。古老中国当时的闭塞蒙昧状态是可惊的。周作人自己在南京当学生的时候，已经渴望冲破这种闭塞和蒙昧。又过了十来年，“文学革命”的口号已经提出来之次年（一九一八），情况仍然没有很大变化，周作人回忆道：“除却一二种节译的小仲马《茶花女遗事》，托尔斯泰《心狱》外，别无世界名著。其次司各得，狄更斯还多，接下去便是高能达利，哈葛得，白懿拜（Buothby）无名氏诸作。”^⑤周作人在这样闭塞的环境里进行翻译工作，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不仅由于他选取的原作的广泛性系统性，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有新的文学观念、新的审美标准。

在周作人之前，林纾是中国第一个大量翻译外国小说的人。这个启蒙之功是不可没的。晚清的觉醒的青年，包括青年时期的鲁迅、周作人兄弟，都经过热爱林译小说的一段。^⑥但是，林纾仍然是个封建文人，没有什么新的文学观念、新的审美标准。正如周作人所说：“译者本来也不是佩服他的长处所以译它，所以译这本书者便因为它有我的长处，因为它像我的缘故。所以司各得小说之可译可读者，就因为它像史汉的缘故，正与将赫胥黎《天演论》比周秦诸子同一道理。”^⑦加以林纾的译文用的是桐城派古文，更不足以显出异邦新声的特色。周作人的翻译工作，从他在日本与鲁迅合作译《域外小说集》时代起，观念就完全不同。鲁迅写的《域外小说集·序言》里，明言他们的目的是要使“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引进异的新的，就是他们共同的观念。这种观念体现在翻译的态度上，也体现在译文上。他们的译文完全打破了林、严的旧套子，力求显出“异域文术新宗”之异在何处、新在何处。

周作人的功绩还在于,把他讲授欧洲文学史当中的内容,以及他在有关外国文学的其他方面的广泛学识,用优美的散文写成大量介绍评论文章,贡献给读者。周作人不仅仅是为了开拓读者的眼界,他是用这些材料来构成他的文化思想,用这些做尺度来进行文化批评,往后我们会看到对神话、童谣、生物学等等的研究都作为思想的基石,支持了他一生的思想。在新文学运动的初期,他把译述介绍外国文学的目的同他的关于“人的文学”的理论联系起来。他说:“因为人类的命运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命运,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命运。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须介绍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⑧从人道主义和大同主义的高度来阐明翻译介绍工作的意义,不能不说这是当时别人都未达到的水平。

四

作为翻译家的周作人出现之后不久,作为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的周作人又出现了。

新文学运动发难之初,陈独秀明确提出:要推倒贵族的、古典的、山林的文学,建设平民的、写实的、社会的文学。这个提法本来很深刻,涉及了文学的几个根本问题。可是他解释这两种文学的区别,都只是从文学语言的技巧风格上着眼。而且连这些也没有在当时文学理论上发生很大影响。当时讨论得最热烈的还是白话文问题,胡适在这个讨论中居于新营垒主将的地位。

他始终只讲“死文学”和“活文学”，只讲用文言文写不出活文学，用白话文才写得出活文学。一九一八年四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面，胡适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总结了新文学运动发难一年多的讨论成果，集中为两句口号：“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篇文章当时被认为名文，它虽然很浅，却正与当时的一般水平相适应。

但是，胡适那样的理论，毕竟太浅了，不足以解决新文学运动中许多更深的问题。其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所谓文学革命，究竟是要用什么样的文学，来革什么样的文学的命？作为文学理论家的周作人在这个时候登场，他在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大半年之后，即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上发表了《人的文学》^⑨，第一次用系统的理论划清了文学革命敌我两方的界限，把中国新文学理论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他指出，生活本来就有“人的生活”和“非人的生活”两种，一切兽性的或强作神性的生活都是非人的生活，“灵肉一致”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人的文学”应该提倡人的生活，反对非人的生活。《人的文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运用人道主义的理论，第一次准确地敏锐地抓住非人生活、非人文学的特征，就是把人不当人，特别是把女人不当人；把别人不当人，也把自己不当人；放纵自己的兽欲，把别人当作兽类；同时又拿了超凡入圣的标准去要求每一个普通人，压杀他们的平凡的要求和权利。反对这种生活，反对欣赏这种生活的文学，便是“人的文学”的任务。周作人虽然还没有能够从本质上揭示“民主文学”和“封建文学”的界限，但是他所抓住的这个特征不是别的，正是封建主义在生活上和文学上的根本特征。